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李方桂博士

胡有瑞

李方桂，山西昔陽人，民前九年生，清華學堂畢業，接著赴美入密歇根大學，獲語言學學士，再入芝加哥大學得語言學博士，並在哈佛大學研究。

民國十八年，他回國即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羅致任研究員，接著，曾先後任教耶魯大學、燕京大學、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臺灣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夏威夷大學。

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我國人文科學現代學術的拓荒者，他與趙元任同為語言學界兩位大師，趙元任被尊為漢語語言學之父，而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為中國這一代極具啓發性建樹的名學者。



(攝惠郭) 影近婦夫士博桂方李

「天下的學問，總得要有人去研究」，就是這個理由，使得李方桂博士在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中，堅守了一甲子。

語言學，是一門新興而冷寂的學問，可是，在李博士的心目中，這門學科不僅富趣味，更具意境。

一甲子——六十年的研究生涯，真是段漫長而又艱辛的人生道路。

對這段艱辛歲月的最好詮釋，該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在美魯格斯大學演講會上，李培德對他的介紹了……

「李教授是當代多才而又廣博的語言學家，他一九二六年在密歇根大學修完本科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就轉到芝加哥大學兩拜名門於沙波爾及花田二大師名下，在此，他鞏固而精深的奠定了語言學基礎。以後數十年他孜孜不倦，時常到蠻荒的地區作田野工作，譬如他初次遠征就是到加州和加拿大北部調查紅印地安人的語言，兩個月的光景，他每天只能吃到土人送他的魚，以及他自己帶去的已經半壞的雞蛋來充饑。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對於魚和雞蛋至今都沒有好感！」

「他在四川調查時，曾爬過索橋，這種橋是用細竹編成索子，架在兩山之巔而又下臨萬丈急流的岷江，要手足並用才能衝過天險！爲了獲取原始資料，他常常需要經歷過這種艱苦的生活同驚險的歷程。」

「總計他下過工夫的有古代德文、古代英文、拉丁文、法文、高加索文、梵文同印歐語言等，他作過調查的有，紅人及西南島、雲貴一帶的僮人、擺夷、泰國各種語言，一直兒到了中國方言和上古音韻學方面，所以我稱他是一位多才而又廣博的語言學家。」

這段描述，道盡了研究語言學歷程的艱苦，也說明了李博士在語言學界所擁有的成就。

今年的五月，李博士攜着夫人的手，雙雙快樂樂樂的回臺北。

這廿年來，他們夫婦對臺北有無盡的依戀，時時回來不說，這次竟打算回來長住一年，「回來，可真熱鬧」，兩夫婦都笑眯了眼。

在他倆回來的第二天，我就急急地去找這兩位慈祥的長者聊天，李博士儒雅如舊，李師母活潑依然，從語言學、做學問、食美食、唱崑曲……真是好好地暢談了一番。

## 那辛苦的三十年

李博士說，這次回來，一方面是退休了，要過過愜適的生活，同時，也要着手整理放在中央研究院裏的貴州方言資料。

說起這些資料，正是三十三年前，他爬索橋，過天險所採集來的。說起這些當年事，李博士已忘記了昔日的辛苦，思緒迴蕩在三十年的悠悠歲月中，只有陶醉，只有收成的喜樂。

他說：「民國三十年，我和張琨（中研院院士）決定到貴州東南部一帶，搜集黑苗、峒家、水家等的語言資料，一共去了三個月，那帶地方難走，那段日子也真苦。」

那時，正是苗變之後，他從貴陽坐車到獨山，再從獨山乘滑竿到一個小縣分，再坐船到溶江。

他說：「那個小縣分是真小，也窮苦得很，我永遠記得，站在縣衙門口，就可看清楚整個縣城的一切。」小縣城的景色他是歷歷在目；可是，縣名他就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已經是三十年前的舊事，可是，對乘船到溶江的沿途情景，李博士一些也忘不掉，而且對當年沿途中的點點滴滴還津津樂道不已。他說，那種船窄而長，可坐三、五個人，舵手都是苗人，水很淺，船走得輕而疾，時時可以聽見水中石頭磨船底的聲音，尤其是船行在湍流時，就如箭般的飛馳。

從溶江、到黎平、又到柳州，一面走、一面訪，「那一帶地方沒有旅館、也沒有小店，晚上只有借住在人家中，在飯桌上打鋪這是常事，白天，也就只有隨便地買些吃食。」「那段日子真辛苦」，李太太憐惜地為李博士作註解；「他回來時，帶了一大堆的資料，可是，也長了滿身的蝨子。」

這些汗和着汗滴、蝨子和辛苦帶回的資料，在李教授這一生的研究中，都是極有用、極珍貴的：「我一直利用着，一直到現在都是有效的基本材料。」

去年，他整理這些資料，完成了一部「泰語研究」，這次，他打算埋首在中研院研究室中，整理、分析，然後編出一本小字典，供將來研究這部分語言學的人作參考。

在昔日的那段採集生涯中，他的足履遍及東南邊陲各地，廣西、雲南、貴州……他全走遍了。

「語言」，怎樣採集呢？那天，我極好奇地打聽着。

他說：「我們到了一個村落，就在民家住下來，有時一住就十來天，我們請他們來，請他們唱一段歌，他們唱，我們就記錄。」

記錄的技巧是，先錄下來，再照原樣唸一遍給唱者聽，有不對的改，不懂的問。「常常，整首歌唸完，全首歌的意思全出來了。」

「分析一首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歌通常不是直接在那敘述一件事，就像詩經一般，人們的解釋

，有時並不能完全抓住原著者的真正心意。」

在這種情況下，李先生說，他對峒家、水家等歌謠的解釋，只是一種「暫時性」的，也許將來有人會了解更多，會作修正。

幽默的李博士，朗聲的笑着說：「我常說，詩經有毛傳，我作的是李傳。」

對即將出版的「李傳」，他是興味無窮，他說，整理出版，至少將來再有人研究時，可作參考資料。

## 語言學的甘與苦

他曾這樣說過：「我立志學語言，這表示，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發財，而且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趣都沒有。」「研究語言學，表示所做所行，全是些沒有野心的工作。」他強調，唯有「興趣」才是這行研究者必具的原則。

其實，在清華唸書時，李博士讀的是醫預科，結果，到了美國，發現自己對拉丁文、德文有興趣，再想想，唸醫實在是太苦了，不如轉學語言，「沒想到，這一轉，就轉了一生。」

他說：「語言學是一種理論，而不是去說某一種話，而且，語言學有很多基本原理、原音、待研究，與我們的說話是無關的。」

至於語言學的範圍在那裏，有次，李博士作了這樣的解說：

「大體說來，一門學問的範圍很難加以斷定，因為範圍會隨學問的演變而增加擴大，我們只能如此說：與語言有關的學問皆稱為語言學，其中包括語言的聲音，文法、音調，以及各地的方言，語言的歷史與民族文化，和心理學等，因此，它的範圍極廣，單拿其中的語言學來說，各種語言皆有它不同的聲音，語言學家爲了系統化地研究其各有的特質，有人用電子儀器側出某種語音的性質、聲音的大小、音程，有些學者還專門用X光照

喉嚨的動作，看看某種音該如何發出來，像這些涉及語言學而使用科學的事情，也應列入語言學範圍。」

語言學，對人類的生活有多少的幫助。他的解釋是：

「任何一門學問對人類的生活有什麼幫助實在難說，當然，如果懂得語言學的原理，那麼在語言教學上有極大的幫助，現在各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日漸頻繁，需要的外交人員也日益增多，一般人只注重學習英、法、德及西班牙等較重要國家的語言，有許多小國家的語言却為人們忽視，譬如懂越南文、泰文，以及非洲各國文字的人比較少，其實駐外人員到了他國，不會說當地的語言，一來心境很苦，二來消息不容易得到，因此，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情形，學習當地的語言是入門訣竅，而語言學家正有助於這種人們對語言的學習。」

「再從文化、歷史上的觀點來看，如果獲得原始資料，則非要懂得一國的語言不可，譬如，看英文本的日本歷史，那麼你的眼光就受到英美人對日本歷史的看法，只有懂得日本人所寫的日本歷史後，才會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綜合言之，語言學家協助人們學習語言，而學習語言後所帶來的成果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研究語言學，最重要的是要採集第一手的資料，「現在的科學研究，注重第一手的資料，如果不去實地調查，則無法獲得第一手資料，沒有新資料就無法產生新見解，繼而無法作研究。」

他說，對語言學的研究，資料的搜集太重要了，「世界有數千種的語言，而其中有許多語言是沒有文字的，單以中國境內的語言來說，種類也是多得數不清，像苗人、擺夷、僮人、蒙族、藏族和高山族，每一族就有一種的語言，但這些各地的方言大都沒有文字的記載，因此要研究它們，則必須要從事實地的調查。」

中國人在世界語言學界居於領導地位的，是趙元任和李方桂，他們兩位的成就，語言學界是這樣的分別：趙博士是漢語語言學之父，而李博士則被封為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李博士說：「所謂非漢語，是包括中國境內漢語（國語）以外的所有語言，例如藏語、蒙古語、苗語、僮語、臺灣高山族的語言等都是。」

在非漢語語言學的研究上，李博士是開拓者，同時，也沿途樹立了指標。

他說：「中國語言學，從前大約包括三方面：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

「這些學問，都有很久遠的歷史，等到甲骨文發現後，文字學的發展又推進了一層，目前在臺灣的國學家們也針對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等三方面繼續開拓語言學的園地。」

「任何一門學問必須不斷地向前發展，才会有新境界的產生，而中國語言學以後的發展，除了仍要繼續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外，應該多研究中國境內各地的方言，譬如臺灣話、客家話以及臺灣高山族的語言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方向。」

不可否認的，國內語言學的發展始終停於起步階段，因為，在這裏，大多數人都學英文、學習其它語言的人出路太少，不過，李教授却認為，語言學值得在國內提倡，而在大學中成立語言系更是必要的。

「中文語言學的文法，音韻皆與一般語文學的原理有關連，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則對中國的東西不能產生新的見解。目前在臺灣教英文的不少，但教英文語言學、英文語言歷史的人則很少，當然有興趣的學生又少之又少了。」

「我始終認為，教英國語言的人，一定要了解中國語言的東西，教中國語言的人必須懂得外國語言的東西，這樣，橋才能在兩方搭建起來，語言學上的理論、原則才能溝通，同時，中國境內有多少語言，各地方言的種類，這些問題也應知道，又如，苗族、傜族、擺夷、蒙族和滿族，在中國歷史上是很重要，唐代的胡人，吐蕃和突厥皆與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可是，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多數只用中文材料，而不用其本來的語言材料，則所獲資料皆非第一手，故無法作深入的瞭解，還有，中國的佛教書籍原來皆用梵文、藏文記載，如能了解梵文、藏文，則對中國的佛教史有很大的幫助，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成立語言學系是必要的。」

## 讀書與童年憶往

非常難得，那天，我坐在中研院爲李博士夫婦預備的宿舍中，用整個下午的時間，與這對「神仙伴侶」閒聊。

李師母的京片子，真是清脆好聽，難怪崑曲同好稱她爲金嗓子。

車子還沒停，李師母就已倚在客廳的窗旁等，到了，茶水、點心，她就忙着張羅，就在李師母忙東忙西間，她忽然發覺：「咦，天這麼熱，你怎麼穿了件長袖襯衫。」

原來，剛洗完澡的李博士，聽到客人來，順手抓了件衣服穿，不是李師母提醒，他說：「啊！我怎麼不知是件長袖。」說着，李博士就笑了起來。

喝着李師母預備的咖啡，大家就隨興地聊着，就那麼自然，話題竟然使李博士圍着童年轉，說讀書、話當年，三個小時的時間，使我竟然有着意想不到的收穫。

「我是山西人，由於父親是在廣東做官，我生在廣東，一直到九歲才回到北京。」

十分奇怪的，當他十歲時要上學，唸的就是所廣東小學堂。「那是廣東人在北平辦的一所小學，在北平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中，一幢平房，收了三班學生，其中一半都是廣東人。」

他稱這所學校是「野鷄學校」，「因爲，學校的老師，全是北京大學、民國大學就讀的學生，他們利用課餘在廣東學堂兼差，賺零用錢，因此，他們不僅教國文、算術，還教生物、化學、圖畫等，反使我們學些新知識。」

做了三年廣東學堂學生，他就與四位親戚一同考中學，結果，只有他考取了北師大附屬中學。

「中學關鍵太大了。」他說：「我一直認爲，唸書的根底全在中學，無論是數學、國文、英文……全在中學紮基，如果基礎打不好，要唸大學就難了。」

「我在中學，數學、物理、化學、英文成績都好，只有國文不太好。」

對作文，李博士一向就怕，他說：「十一、二歲年紀，就要寫論文，我最怕寫了，常常二十五個字一行，

我寫四行就交卷，一直到初三，有位桐城派的老先生教古文，別人都說他教得好，我就耐着性子去學，遇到作文課，一看別人都在磨桌子，我也學着磨，作文也由四行，慢慢增加到八行，十六行，結果，我的文章竟寫好了。」

成爲學世知名的學者，可是，回憶從前，他堅持：「我從來沒有用過功。」

他從小到大讀書的訣竅是：上課絕對專心聽講，下了課就甩開書，考試全靠在堂上聽講得來的知識。

師大附中畢業那年，他決定考三所大學，進協和學醫，讀北洋大學學工，其次是考清華學堂赴美；「三所大學的入學試，全要用英文答題，尤其是協和還必須作英文口試。」

「在那段時期，我是真用了功，因為科科考英文，非預備不可，結果我買了教科書在家裏看；高興的是三所學校全考取了。」

在左思右量下，最後，他選擇了清華，「那年我們一共取了七名。」

對清華，李博士有着太多的懷念，儘管已經是七十多的人了，可是，當年清華園的點點滴滴，他依然縈迴在心中。

「清華學生都住校，管得嚴極了，每週六下午可以回家，但是必須家長寫假條，結果，我們人人都有家長們請假的圖章，一蓋章就可以出校門，真是比管女生還嚴。」

提起清華，李博士就無限感慨，十分神往。「清華園真美，在我記憶中極深，那時的清華，在北平城西，原是清朝貝勒王府，有美麗雅緻的花園，真是美極了。」

「在清華讀完預科，我一直想，去美國是學工，還是學理。」

「幾經思考，我決定要學醫，因為，有位親戚就勸過我，學任何一科，將來必定會走上仕途，可是做官必須靠背景，唯有學醫，不必靠人，只要靠自己，因此，我打定主意學醫。」

在美國期間，他專心爲進入醫科作準備，拉丁文、希臘文全要學，在研究語文中，他發覺語言學的奧妙，

正巧，密歇根大學的語言學很有名，他就決定轉學語言學。

## 語言學上的成就

李博士常告訴人，語言學他是學來試試看的，結果，一試可就拔不出來了。

就在短短的兩年中，他先後完成了三個學位——最快、最短的衝刺。

這三個學位是一九二六密歇根大學畢業，接着先後在芝加哥大學領取碩士與博士學位。

在李博士成功的生涯中，語言學鼻祖花田及沙披爾兩人居功極大。

李師母曾經這樣說過：「三十八年以前，方桂以清華留學生資格，來到密歇根大學，兩年修完了他的學位，以後轉到芝加哥大學，在那裏他遇到語言學的鼻祖花田及沙披爾兩位先生，方桂在兩年中而出名門，由此也奠定了他終身的基業。如今這二位大師都下世多年了；當時由於他們的卓識，在看了方桂的一篇報告後，就認為可以發展成為博士論文，於是，那時才動手申請博士考試。他的論文已完成半年以後才到頒授學位的時期優哉游哉，沙老師又為他安排資金到哈佛大學游學半年才回來得學位，今日小有成就，二大師不及見他們手植的碩果，至堪悲惜。」

在領取學術界殊榮——密歇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時，該校語言系主任，對李博士一生的成就，有着極生動而深入的敘述：

「李方桂是本校一九二六班文學士，他在本校大學部表現了優異的成績之後，轉入芝加哥大學，很快的就在印地安語言學方面，樹立下超羣的成就，接着，他就把他廣泛的研究範圍擴充到中國古音韻學漢藏語言系統，一直到整個泰語系的比較和歷史研究，他的實地工作是精確而廣泛，他的分析方法是巧實而巧妙，而他的敘述說理，更是簡明而透徹，這三個條件，不但使他在個別語言研究上樹立了絕對權威，同時它們也早就成了一

般語言學工作者的模範和榜樣。他對於學術上的努力是本於不自私的熱誠，而在事業的接觸上，更一直表現出他的開放、豪爽和大方。所以不論是他的同輩和後進，無一不是親愛而又佩服他的，他對後輩的提携尤其熱心。」

他的門生丁邦新曾說：「李先生的研究中，除去印地安語外，臺語、藏語，無一不與漢語有密切的關聯，可以說先生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漢藏語族的研究，一九五一年，Robert Shafer 及 Morris Swadesh 提出一個新穎說法，認為 Athabaskan 語跟漢語也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最近又有別的人重提舊事，這一個說法意外地把李先生印地安語的研究也跟漢語研究連結在一起，現在對這一新問題，李先生是語言學界唯一的一位最有資格評斷的學者。」

丁邦新推崇李先生的治學態度，他說：「先生為學的態度極其嚴謹，教學的態度極其熱誠，工作更是認真，專心致志，恒久不輟。」

這幾十年來研究語言學的中國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李先生的影響，著名的如董同龢、周法高、張琨等諸先生無一不是向李先生請益過的，不僅中國學者如此，其他如美國的研究漢藏語的學者許多人都書文的序或腳注式的謝啓裏謝謝李先生的指導。著名的如 Nicholas Bodman, Hugh Stimson 等人，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先生對於語言學界的影響。

已故的語言學家董同龢就說過：「我的文章裏面嚴謹的說法，都是李先生的訓練，不該推論的地方就不說話。」

在中央研究院的文史研究圈中，「李先生」三個字，代表的是敬愛、尊重和仰慕，而李先生對學生們常鼓勵的話是：有些問題放在腦筋裏，隔些時候也許觸類旁通。有些文章寫好以後稍擱一下，不要急着發表，要使作品有經久的學術價值，必須經過深思熟慮。

## 洒脱的人生觀

認識李先生夫婦已經八年了，這其間，他們兩人曾屢屢回國，每一次，我們都會見面晤談。

很奇怪的是，八年來，這對夫婦始終年輕，「歲月」在他倆的身上似乎落不下痕跡，反而更增添了滋潤。瘦長身形的李博士，溫文儒雅，臉上、眼中，始終帶着慈祥的笑容，而李太太，親切和藹，對人尤其熱摯，面對這樣一對長者，使人直彷彿回到了遙遠的北平故國中。

美食、笛子和運動，是這對學人夫婦精神生活的一環，「在夏威夷，我和李先生每天必定要游回家」，李師母得意地說着，我想，這就是他倆永遠散放「年輕」氣息的原因之一了。

我曾問過李先生，他的人生觀是什麼，他的答覆簡短而乾脆：「我這人馬馬虎虎得很。」

他說：「這一生我都是隨着興趣兩個字」，對語言學發生了興趣，又就研究六十年，「沒有野心，只有興趣，我不想做大官，更不想發大財。」

他說，他的嗜好也永遠是跟着興趣走，在清華唸書時，喜歡打網球，出國留學喜歡打橋牌，唸中學時會下圍棋，而麻將更是從小就會了，再如繪畫、美術、音樂，他全有興趣，「可以說，玩的東西我都有興趣。」

李師母是崑曲名家，說起李博士的學會吹笛，也是件饒有趣味的事，尤其是由李師母娓娓道來。

「抗戰時，我們在成都，沒事時學校的同事就聚在一起唱曲，可惜，會吹笛的只有一個人，因此，每次大家輪個半天也輪不到唱一曲，大概是方桂看我們這些戲迷太可憐了，有天就問那位吹笛的先生，『吹笛難不難』，回到家，李先生就每天拿着笛子不出聲的練習，到了一個時期，他就吹出聲來練習。」

「有一天到了聚會中，我就對人說，今天好了，吹笛的增加一人，大家起初都不相信，直到李先生拿出笛子來吹可把大家驚住了，一曲吹完，人人讚好，都不相信默默中他練得這麼好，於是，人人都要他配曲，我只得跟人說：『不行，因為他只學會了思凡中的這一段。』」

李師母說，這是李先生的長處，不做事則罷，一做事必定仔細而專精地做下去，在沒有做成前絕不放棄。李師母的烹飪和文章，都是膾炙人口的，她曾經出版過一本食譜，其中每一幅美食的照片，就出自李先生之手；而「徐櫻」這個名字所寫下的憶舊索往性的文章，也是極獲好評的。

在李先生諸多嗜好中，最令他入迷的還是「讀書」了。

他說：「我喜歡看書，不過，我是雜亂無章的看，有書就看。」

除了學術性的書外，李先生更是位小說迷，因此，他對國內作家的書，都如數家珍，每部書他所提出的批評都是中肯得很，直如行家。

李先生不僅愛看書，而且也好收集書，家中堆得滿滿的，對這些書，李博士形容：「到我手中的書，總與我所學多少有些關係。」這次回來，他特別將自己藏書的三分之一帶了回來，悉數送給中研院史語所，這兩千多冊的書運到時，史語所的同仁都極高興：「好些都是極昂貴的珍貴書籍。」面對着這批贈書，這位「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的滿腔心思，就可以瞭然了，也因此，國內的學人對他更是敬重了。

在旅外學人掀起「回歸」風的時候，李博士却帶着書回來。

前陣子，美國國家科學院曾選取了十多位語言學家，預備組成一個訪問團到中國大陸，接到通知，李博士拒絕了，他的理由很特別：「我是在中國大陸生長的人，那裏的景色我是太熟悉了。」

婉轉的理由中，滿含着深蘊的情懷，接着，他就整理行裝，快快乐樂地回來了。

他說：「住滿了一年，也許我會再延一年。」話音中，散放着快樂，洋溢着滿足。

我總這樣想，他真是位洒脱、率真而儒雅的學者。

**李方桂主要著作：**①一九四〇年在上海出版的「龍州土語」。②一九五六年臺北出版的「武鳴土語」。③一

九三〇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的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④另有七十篇研究專文，分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專刊、及國際性專刊上。